

结构、行动与历史： 社会学视野下革命研究的源流^{*}

马学军 应 星

提 要：“革命”是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以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革命研究包含了结构与行动、现实与历史、社会与政治、民情与观念等多个面向，把现代革命既理解为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步转变，又视为与具体行动者的能动性紧密相关的历史进程。20世纪欧美历史社会学的革命研究或偏于结构分析，或偏于文化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学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行动和思想观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结构、行动和历史的维度，重返经典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传统，辨析欧美历史社会学中革命研究的流变，梳理当代中国社会学革命研究的成果，强化革命主题对拓展社会学想象力的意义。

关键词：结构 行动 历史社会学 革命研究

一、引言：“发生革命”抑或“制造革命”？

美国著名学者斯考切波在其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以下简称《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制造的”（Revolution comes, not made）。她认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几种主要的革命研究理论对革命总体进程的分析从根本上是一样的，即“大约都将这种普遍性的革命进程模式视为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或者是由意识的目标所引导的运动。”为超越既有革命的研究理论，也为了解释她所谓的“社会革命”，她认为首先要

* 本文是中国农业大学2021年自主立项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党群关系研究（1921—1925）”（项目编号：2021TC005；主持人：马学军）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Fund）的支持。

采用一种结构性视角，而非意志性视角。她断言革命是在客观的社会结构下发生的，而非由某些群体、个人有意识或有目标发动或制造的（斯考切波，2019：15—19）。

斯考切波借鉴马克思的思想，从结构性视角分析社会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也被视为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然而，这样的结构性分析视角后来也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和争议。如果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由结构性的关系所决定，那么如何理解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中的作用？如何理解精神或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些争论促使我们重新反思：革命究竟是由客观结构产生的，还是由某些群体或个人有意识制造或发动的？结构、行动和文化在革命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又如何相互作用？

这些争论不仅存在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中，也存在于海外中国学的相关研究中。周锡瑞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再研究的十个议题，其中有五个议题就涉及中国革命研究中结构性与偶然性、结构性与行动者、结构性与组织性的问题争论。他在文中多次与斯考切波的观点对话，表达出既接受又批评的态度。他指出，应对那种受斯考切波观点影响而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农村危机预先决定了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决定论的观点保持怀疑态度，且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革命起到限定作用的社会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革命决定论的重大缺陷，在于忽视了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而这一点对理解中国革命至关重要（周锡瑞，2013：192、195、198）。

那么，如何理解在革命研究中的这些争论？这些争论从本质上触及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即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关系。斯考切波自言其分析革命的结构性视角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而来的。可是，一些相反的批评观点也自称来自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张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先锋队组织和阶级行动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声称来自马克思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追根溯源去看在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和经典著作中是如何研究现代革命的。此外，斯考切波从结构性视角分析社会革命也被认为是受到了托克维尔观点的影响。那么，在托克维尔的整体思想和经典著作中是如何研究现代革命的？由此，我们需重新返回到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革命研究传统，去看两位经典社会学家是如何研究革命的，以此我们也才能进一步说明她在什么意义上是借鉴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思想的。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在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对现代官僚组织的分析成为后来社会学革命研究中重视行动和组织的重要思想来源。他提出的“卡里斯玛”也更多被用来形容那些具有超凡魅

力的“革命领袖”。他对 1905 年俄国革命高度关注并有富于启发的研究（韦伯，2015）。但比起马克思和托克维尔，韦伯并未对现代革命展开太多专门的研究，本文也就不单独讨论韦伯的革命研究传统了。

当然，本文开篇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引发的争论出发，并非仅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社会学革命研究的范式，其宗旨还在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界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不管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还是在组织行动和人心观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从结构、行动和历史这三个维度出发，重返经典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传统，辨析美国历史社会学革命研究的流变，梳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成果，以勾勒社会学革命研究的基本脉络，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

二、西方经典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传统

“革命”是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就单独列出一章“社会学家和 1848 年革命”，讨论孔德、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态度和观点。阿隆认为，研究社会学家对 1848 年革命的态度具有多方面意义：一方面，在 1848 年至 1851 年这段时间里，人们可以看到类似于 20 世纪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对各种事件的评价都具有各自学说的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种重要的评论、各种分析方法以及这些著作发展出的抽象理论的意义”（阿隆，2015：254）。孔德虽然也关注 1848 年欧洲革命，但并未开展深入的研究，且一直蛰居在象牙塔中。与孔德不同，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不仅参加了欧洲革命，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分别形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的经典著作。因此，经典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传统首先要回溯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革命研究思想。

（一）马克思的革命研究传统

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论断不仅指出了革命的结构性特征，也指出了革命与阶级行动、革命与

历史变迁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对革命分析的总体性观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是开创了将结构史与事件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社会学，即把结构、局势和行动者三个要素折叠在同一时段的事件分析中（应星，2017）。可以说，马克思研究中的革命包含了结构、行动与历史三个基本面向。

首先，马克思笔下的革命是与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直接相连的。这一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表达过，也更鲜明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中。如麦克莱伦（2016：230）所说的“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观点是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结果，也即，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结构性分析尽管指涉的是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动，但我们并不能就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社会层面的革命，更不能窄化为革命的社会史分析。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二者不是分割的。他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如果说具有政治灵魂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么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马克思，2002：395）阿隆（2015：266）也指出，马克思是以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来理解政治事件，“他力图揭示在纯粹的政治冲突里各种社会集团的剧烈角逐是怎样表现的，或者是怎样上升为政治角逐的”。

其次，马克思的革命分析又是与阶级行动与人物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我们丝毫不能忽视马克思理论中的“行动”要素。行动者是马克思事件社会学分析的基本要素，行动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构成历史转折的关键要素——这种行动者远不止波拿巴，而是包含了1848—1851年法国政坛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事者。而就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言，社会经济基础对于理解阶级关系固然重要，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阶级行动也同样重要。阿隆（2015，166—169）归纳了马克思使用和定义“阶级”概念的三种类型：第一类集中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划分是根据他们收入的来源划分的；第二类体现在在对法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文章中，划分了金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等数量更多的阶级，且更看重某些集团或阶级的行动以及对政治事件

的影响，而非收入多少；第三类体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小农是否作为一个阶级的经典论述上，尤其看重其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除了经济基础之外，阶级行动和阶级意识是理解阶级重要的维度。法国小农虽然生活方式相近，但并没有形成利益一致的共同体，也没在意识到与其他阶级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共同的行动，因此就不构成“阶级”。

最后，马克思的革命分析还是历史性的，与其历史唯物主义密不可分。这是马克思不同于庸俗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地方，也是不同于既往革命分析的结构视角和行动视角的关键。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以辩证唯物史观的总体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即将社会现象置于社会与历史的总体过程中来确定它们的性质和意义，考察它们的产生、变化和发展。这种总体性分析方法也集中表现在他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中。卢卡奇（2009：47—48）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方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这一方法既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又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唯心主义陷入了把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等同于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相反，庸俗唯物主义者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庸俗唯物论，也不同于唯心主义。他的革命分析是结构的、行动的和历史的，不能简单化约为结构论或行动论。

（二）托克维尔的革命研究传统

出身于法国旧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曾经是七月王朝众议院的代表，还参加过制宪会议并出任外交部长，亲历了共和国的覆灭和路易·波拿巴的上台，可谓法国大革命的见证者。他毕生都在思考法国大革命，思考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为什么经历了如此多的动荡又走向了专制？作为孟德斯鸠的信徒，托克维尔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现代民主和法国大革命，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本经典著作，分析了大革命发生的长期性因素，讨论了革命前后的政制变化，同时还注重“民情（mores）”在革命进程以及民主运行中的作用。这些思想使他成为经典社会学的大师之一，也足以让我们去重视他的革命观。

首先，托克维尔的革命分析，其思想主旨是关心现代民主问题。不像孔德注重现代社会的工业问题，也不像马克思着眼于资本主义问题，托克维尔的核心关注是现代民主问题。托克维尔的两本经典著作，“关于美国的这本书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民主社会是最自由的民主社会？《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想回

答：“为什么法国在朝民主演变、保持自由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阿隆，2015：204）。这就是说，现代民主社会可能出现不同的样态，可以是自由的民主社会，也可以是专制的民主社会。对现代民主的思考构成托克维尔思想的中心问题。这一思想主旨对于理解他的法国大革命研究至关重要。傅勒（2020：166）认为传统的法国大革命研究长期从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动来分析阶级的升降和革命的发生，这只能解释革命的起源问题，而不能解释革命此后的反复以及专制的复辟。因此，对大革命的研究就不能化约为经济或社会分析，而应带入政治分析，对大革命有批判的反思，反思追求自由的大革命为什么走向了专制？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的研究就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其次，托克维尔的革命分析既注重长时期政治结构的变动，也重视短时期个人行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应从长时段的旧制度的崩溃入手分析。诚如他自己所言“法国大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托克维尔，1997：241）在他笔下，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既是欧洲所有国家中最民主、最平等，又是政治自由最少的社会。中世纪后期兴起的绝对王权在扩张自身权力的同时也无意中成了推动民主革命的工具。法国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强化并非如人们所说是大革命的功绩和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托克维尔，1997：74）。

尽管托克维尔非常重视从长期的政治结构变动来理解大革命的爆发，但我们不能就简单认为他是结构分析者。实际上，他对大革命中人们的行为、激情和态度都作了极为细腻的分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分析大革命时，托克维尔继续采用了其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方法，从社会状态与政治组织和行动的互动来理解大革命这一宏大事件相对于旧制度历史的延续和断裂，同时在行动者的观念意图与历史进程的距离之间，揭示了革命的巨大政治动力的某种自主性。”（崇明，2014：44）革命的发生是结构性的，但革命一旦发生，革命的力量和走向就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行动者的意图、情感、态度密切关联。

最后，托克维尔的革命分析注重“民情”的重要作用。托克维尔受孟德斯鸠提出的“民情”概念的深刻影响，分析了“民情”对理解美国和法国不同民主样态的

重要性。他认为美国民主政体之所以是自由的，有三个原因：美国社会的偶然和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地位、法律、习惯与风俗。其中地理和历史地位不如法律重要，而法律则不如习惯与风俗教重要。在他看来，习俗和信仰是影响人的自由的重要条件，习俗的决定因素则是宗教。对此，阿隆（2015：213）指出“如果一定要找出美国的自由得以存在、法国的自由前途不稳的唯一原因。那么，托克维尔认为可能是因为美国社会能够把宗教意识和自由意识结合起来，而法国社会则备受教会与民主、宗教与自由相互对立之苦的缘故。”

就法国而言，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不理解大革命前六十年法国旧制度的变动，就不能理解大革命的发生，但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法国的“民情”。“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托克维尔，1997：241）法国的这种民族性格体现在他所描写的“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托克维尔，1997：241—242）。因此，在他看来，旧制度的结构变动固然是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但同样的结构性变动未必会产生同样的革命，因为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其“民情”完全不同。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身份平等已产生了革命性的效应，但法国社会的“民情”并没有产生相应变化，缺乏可以减少民主盲目本能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也恰恰是这样的“民情”，使得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动荡，走向了专制。如他所言“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托克维尔，2009：绪论10）托克维尔从“民情”角度分析大革命，既不同于革命的经济社会结构分析，也不同于革命的政治制度分析，而是开创出一条非常独特的革命研究路径。如果不了解支撑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民情”基础，我们就难以深入理解世界各国的革命类型以及革命运行和波动的底色及潜层基础。

三、欧美当代历史社会学中的革命研究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社会学也随之在美国得以学

科化和专业化。此后，帕森斯式的“宏大理论”与拉扎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长期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就在这一时期，不仅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母题的“革命”丧失了，而且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角也都被遮蔽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动和欧美社会反叛思潮的兴起，结构功能主义静态的发展模式和线性的进化论受到质疑，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多样性、具体事件以及意义性行动，美国社会学由此兴起比较历史分析的热潮，集体行为、社会运动、革命等议题也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之中（斯考切波，2007：5—6）。

美国历史社会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体经历了三波思潮。第一波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关注宏大的政治结构及其历史变迁，代表人物是摩尔、本迪克斯和李普塞特；第二波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侧重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从结构性视角分析诸如革命爆发、国家建构、资本主义形态的不同历史演化轨迹，代表人物是蒂利和斯考切波；第三波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此时发生了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向，侧重对文化、符号、意义以及行动者能动性的分析（严飞，2019）。在比较历史分析的革命研究脉络中，摩尔是奠基者但还是过渡性的，而斯考切波是真正谨守比较历史分析的因果分析路径并最终将其定型的代表人物（应星，2021a）。因此，本文就以斯考切波为代表，分析美国历史社会学第二波革命研究的结构分析。

在美国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研究中，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深刻体现在对革命的研究中。其中，林恩·亨特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以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而闻名。她于1989年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明确提出了“新文化史”的概念，也确定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外，亚当斯等人2005年出版的《再造现代性：政治、历史和社会学》（Adams et al., 2005）和戈尔斯基2003年出版的《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戈尔斯基，2021）都被认为是文化和行动取向的历史社会学第三波代表之作。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林恩·亨特为代表，分析美国历史社会学第三波革命研究的文化视角。

（一）斯考切波所代表的结构分析取向

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确立革命在历史社会学的位置有不可否认的贡献，但也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和争议。其中，很多批评者认为她有结构决定论倾向，忽视了行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文化、精神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那么，她为什么采用

结构分析？她所用的“结构”是指什么？她又是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些批评的？

斯考切波认为自己研究的不是通常的革命，而是发生极少、又影响巨大的“社会革命”。这些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国家组织、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而且还具有重大的民族意义和世界意义。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再到中国革命，都是典型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斯考切波，2019：4—5）。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并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对社会革命的分析就不能仅从单一事件或单一因素来着手，而应该把革命视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时发生剧烈变化的整体过程，其中阶级斗争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她看来，当代美国社会科学解释革命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某种程度都具有意志论的倾向，把革命的整个进程大多解释为由某些动机、意识或目的所引导的。为超越既有革命的研究理论，也为了解释社会革命，她认为需要采用一种结构性视角，而非意志性视角。基于此，她借鉴马克思的观点，重视结构性的阶级冲突，提出革命的发生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产物，而不是有组织地、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不过，她认为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动和学术研究的推进，有必要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关系，来修正马克思分析革命的结构性观点。她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基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这与现实发生的革命并不符合，这些革命多发生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斯考切波，2019：350）。她还指出，与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不同，二战后一些独立民族国家发生的革命，如墨西哥、越南，多是处于依附性国际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各个阶级以及经济条件的关系也不同。要理解这些国家革命危机的根源，就必须追踪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对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影响，而不能仅限于讨论国内的阶级冲突（斯考切波，2019：346—349）。显然，她在借鉴马克思的阶级关系观点时又作了修正，提出需要重视上层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的国际关系。这三个维度就构成了她对革命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基本原则。

然而，马克思分析革命的行动视角和历史视角在斯考切波这里被完全忽视了。尽管她在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先锋队组织和阶级意识的观点，提到了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卢卡奇和葛兰西强调阶级意识和霸权的观点，但她对这些观点并没有做深入分析，就武断认为这些都是忽视革命发生的客观结构性条件的目的论和意志论（斯考切波，2019：16、208—210）。尽管她也指出二战后拉美一些国家发生

的革命不同于法国、俄国和中国，也承认意志和精神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但还是坚持认为革命“完全是国内外结构性矛盾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公然叫嚣的革命者的尽心策划之力”（斯考切波，2019：348）。尽管她在文中也用“接合”（conjuncture）一词来处理革命的结构与行动的张力，她后来在回应中也试图调和结构分析与行动分析，但她终归还是坚持结构分析是根本的（斯考切波，2019：译序11—13）。可以说，斯考切波对马克思革命分析中的结构、行动和历史的总体视角做了中层化的理论改造，将其改造为强结构分析，而行动分析和历史分析在其中丧失了重要性位置。

（二）林恩·亨特所代表的文化分析取向

对斯考切波这种强结构性的革命分析观点，另一个重要的批评是认为她忽视了精神、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亨特所代表的新文化史分析就试图突破革命的结构分析，倡导革命的文化分析。她在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既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从经济—社会的维度解释法国大革命，也不同意政治史学家从政治维度解释法国大革命，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政治文化上。正如她所说的，“在我撰写本书时，正值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社会史学家与弗朗索瓦·傅勒的追溯者以及强调政治史的史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我有意采取中间立场，从各方观点中汲取对我最为有用的部分，并不断向前推进”。（亨特，2020：中文版序言3）她在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托克维尔和斯考切波的研究以及现代化模式分析，其共同之处在于忽视革命行动者本身意图、忽视革命自身带来的意义和文化（亨特，2020：10）。

在她看来，法国大革命主要不是新生产方式或经济现代化的出现，而是革命政治文化的出现：政体结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和民众大动员的影响下改变，政治语言、政治仪式和政治组织都呈现出新形式、新意义；革命者通过语言、意象与日常的政治活动，致力于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和社会关系。她强调“这不是说法国大革命仅仅是思想上的革命，或者政治一定先于社会而不可能相反。政治上的革命应该是想法与现实，意图与环境，集体实践与社会情境之间的激烈互动。即使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不能解释革命政治，但也不能将其置之不理，毕竟法国大革命是由人缔造的，而且有些相对于另一些来说对革命政治更感兴趣”（亨特，2020：25）。因此，关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她认为是“结”或“莫比乌斯带”，错综交织，没有永久

不变的上、下之分（亨特，2020：20周年版序言2—3）。革命政治吸引了一些个人与群体，他们又反过来塑造了革命政治的运用。因此，我们既可以看见她对革命的修辞学、革命实践的象征形式分析，也可以看见她对革命的政治地理学分析以及对革命中的局外人、文化中间人的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在全球史学中开始流行，也对中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产生影响。新文化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关注人的内在经验、关注符号的意义，由此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现象提供新的视角。新文化史承认托克维尔是其范式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然而，在托克维尔所开创的革命的“民情”分析中，是将政治分析和行动分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非单独割裂出来的文化因素。新文化史的革命研究往往过于执着于仪式、符号和意义等文化要素的分析，脱离了与结构史、制度史的结合，这样就很容易落入碎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窠臼。

四、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的革命研究

中国20世纪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其规模的宏大性和影响的深远性来说，堪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比。中国革命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主题。然而，革命研究在1979年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中长期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因应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转变，将研究重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新问题、新现象上，体现了社会学因应时代之需的学科特点。其次，现代西方学界多受美国科学主义方法论影响，呈现出学科高度分化的格局，往往强化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学科界限，而历史社会学只是社会学内部无数分支学科的一支，占据更为主流位置的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等研究领域。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方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在中国社会学视野中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它被打散、消融在其他分支领域里，被人们视而不见。而最近十多年来，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革命研究的意义日渐引起社会学界的重视甚至有了“社会学的历史转向”的说法（刘亚秋，2013）。

若借用斯考切波所定义的“社会革命”概念，中国现代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

革命，它不能被视为某个孤立的时段发生的某次重大政治事件，也不是一场普通的政权易位的政治革命，而应被视为一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时发生剧烈变化、且变化具有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历史过程。这也就需要社会学从总体性视角出发，整体地、系统地、历史地理解中国 20 世纪革命尤其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学者提出应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三个革命史相互贯通，以此才能洞察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王奇生，2013：96）。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并不是以 1949 年为界的。“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而言，无论革命还是执政，1949 年并不是一条鸿沟，相反 1949 年前后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继续推进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1949 年之后，革命挂帅，革命主导一切、改造一切，革命塑造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灵，颠覆一切知识价值和道德伦理，也渗透到社会最底层和偏僻的乡村角落”（王奇生，2015）。因此，中共领导的革命并非限于狭义的 1949 年前的革命史，也包括了 1949 年后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一个中国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道德价值深刻改变的长期历史过程。甚至改革开放也常被人们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不过，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毕竟是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为了不引起论题的混淆，本文所指称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包含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进程。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过程的研究，孙立平（2005）将其称为“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源流研究。尽管这个说法尚未在社会学界得到一致的认同，但事实上，社会学界已经在中共革命所牵动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组织行动和人心观念等方面都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权且以“中国共产主义文明”为线索，将国内散落在各分支领域的革命研究成果“打捞”并整理出来，以引起学界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本文以下分三个时段来评述与中共革命相关的研究范式、研究主题和成果。

（一）20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处于恢复重建、起步前行阶段，西方现代化理论对国内社会学界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一理论最早源起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本来是去历史、去革命的。继之而起的依附理论大多被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主要涉及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发展社会学

的基本范式。但是，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学界后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向：即中国社会学者更关心的是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维度尤其革命史维度。

孙立平是这一时期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 20 世纪革命的代表人物。他从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三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因子之间的关系来切入中国现代化及革命进程的研究。在他看来，在传统中国史中贵族的衰落与士绅的崛起是引起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皇权的统治逐步加强，政治整合的程度明显提高，但随着近代社会力量的兴起以及外部冲击，传统社会在近代受到现代化挑战时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晚清社会面对内部的政治衰败和外部的强力冲击，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能扼止政治衰败的过程，且在革命后出现权威危机，政治分裂和社会解体程度进一步加深，地方主义因素对旧政权的垮台和新政权的建立，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的社会体制，有效地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孙立平，1988，1991，1992，1994）。

借用现代化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以及中国近代社会转变，其特点是偏重结构分析，能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段社会结构的形态和变化趋势。不过，这种结构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此时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借用色彩还比较浓厚，而对中国现代化及革命的历史情景以及行动者能动性还缺乏具体而深入的社会学研究。

（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1 世纪 00 年代初期

这一时期，国家—社会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等相继从域外引入进来，而中国社会学界在受到这些理论范式影响的同时，也开始强调要找到分析中国社会复杂性的独特路径，并意识到要深刻理解当下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对传统特别是中共革命传统的研究。有几个标志性的研究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的这种变化。

首先是单位制研究向历史纵深推进。单位制研究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一个突出的研究亮点。国内学界最早由路风（1989）提出了“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指出单位具有功能合一性、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非契约性关系、资源和人员的不可流动性以及父爱主义的特点。路风（1993）后来发表了第二篇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从抗日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分析了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强调了单位是抗日根据地时期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形式的承续。路风虽然并不在社会学学科从业，但他的这两篇研究对社会学领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也使社会学界开始意识到中共革命传统与当下体制结构变动之间的深刻关联。李猛、周飞舟和李康（1996）借用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探讨了单位组织内部制度化的运作机制，认为这种“制度化”特征表现为仪式化活动、一致性政治学和幕后解决，德治性再分配体制以及以纵向关系网络为特征的权力结构。“德治性再分配体制”概念的提出凸现了中共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新德治”体制。

其次是孙立平从1994年开始倡导的中国农村土改口述史研究，以此切入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整体性和源流性研究。孙立平（1997）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启发下，提出收集并研究中国农村土改口述史资料，由此分析建国后乡村底层社会的权力运作逻辑及其历史后果，并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与现实逻辑。他所倡导的对普通人物的口述史研究，并不局限在对权力的实践分析上，而是尝试将土地革命场景中的权力实践与农民整体的国家观念、精神结构乃至革命的“心灵后果”一同勾画出来，由此推动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出现（孟庆延，2013）。《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也可以看成是受到土改口述史研究范式感召的作品（应星，2001）。

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邓正来，1999）和“法团主义”研究范式对国内社会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周雪光（1992）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张静（1998a）主编的《国家与社会》是国家与社会范式下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而张静（1998b）在《法团主义》中还引介了法团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模式，并讨论了法团主义模式运用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限制及问题。她以国营企业的职工代表为案例，认为这个联合体并不具有垄断权力，而是被体制所统合，起到中介作用，是一个通过行政方法将分散利益组织化、并传递到体制内的“中介”机制，集结了控制和利益表达两种功能。这些范式势必涉及对国家、社会及法团的历史维度的考察。不过，来自西方的“国家与社会”“法团主义”等研究范式是否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值得反思的。实际上，无论是近现代的中国，还是当代中国，都与西方社会有巨大差别。中国社会需要摸索出更贴合自己历史和社会特点的社会理论范式。赵鼎新（2005）站在中国社会的角度，对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和革命理论发展作了较有启发性的述评。

（三）21世纪00年代中期以来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社会学在继续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

越来越重视历史的视野，呈现出“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刘亚秋，2013；肖瑛，2016），并进一步提出了“把革命带回（到社会学视野中）来”的问题，尝试自觉地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应星，2016）。而一些主要在其他分支领域耕耘的社会学者也在不断强化其历史意识。社会学的重要期刊相继组织了历史社会学、社会视野下的中国革命、新革命史等专题讨论。在这种议题转化、视野拓展和专题讨论的学术氛围中，出现了许多关联到中共革命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议题广泛，包括对中共党、政、军、企、工、农、妇、民众等组织形态，以及群众路线、阶级话语、思想改造等政治文化的具体研究，涉及以往各分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笔者下面就扼要地从中共政治文化及军事组织、政府及国有企业、群众路线及群众团体、思想改造及道德重塑这四个类别来梳理并简评这个阶段的研究。

1. 中共政治文化及军事组织的源流研究。此前中国社会学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总体性体制变迁，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缺乏研究。我们提出“把革命带回来”，则是要强调中共的政治文化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已经有了雏形，而到中共开始独立掌握军队和政权的苏维埃时期则逐渐走向成熟，历史社会学可以围绕阶级政治、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分析。我们近年来主要围绕民主集中制在中国的渊源流变展开了若干研究：通过对江西万安暴动的研究揭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三重张力；通过对江西早期党团的组织网络研究，揭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中学校与地缘的关键影响；还从“以史解经”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进行整全性研究的思考（应星、李夏，2014；应星，2015，2016，2021b）。可以说，对中共早期政治文化的研究开启了社会学界研究中共革命的自觉意识。

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还很少见到对中共军队的专门研究。然而，中共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基础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共革命不同于苏维埃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中共的政治制度、组织架构和政治文化的成熟与军队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近年通过梳理朱毛红军确立以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部队及其割据地区党组织的过程，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分析了以毛泽东为首要领袖的红四军在苏维埃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认为其不仅创造了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更

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应星，2018）。社会学对军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家和政党形态，从而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2017）对西方国家的军队与国家关系作过专门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对军队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可以与之构成对话关系。

2. 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历史变迁研究。国家治理和政府行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冯仕政（2007, 2011, 2012）从历史视角分析了南街村在1981—2000年近三十年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体制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并以政体为中心，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国家运动”的形成和变异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他还把信访制度的形成和演化放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加以透视。周雪光（2014, 2017, 2019）从大历史视野出发解读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指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他还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提出应从中国历史过程中寻找认识和解读中国国家治理的线索。而我们在对中共根据地的军事发包制的研究中指出，军事发包制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各根据地军区和军分区两级分别建立起与上级的军事承包关系，有效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是理解当代行政发包制的重要根源（应星，2020）。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正在打通与中共革命研究的关联。

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同被视为“单位”。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中的单位体制、技术传承、生产激励、劳动关系和组织变迁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吴长青（2012）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初国营企业的劳动激励，认为中国国营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形成原因，不在于争夺生产控制权的反抗问题，而是由于当时国营企业治理中所蕴含的革命伦理与这种劳动纪律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王星（2014）对中国工厂师徒制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国企改制的历史变迁过程研究，揭示了师徒制技能传承的制度基础和动力机制。贾文娟（2016）通过对一家建于1953年的国有重型工业企业深入的工业民族志研究，揭示同时嵌入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工人、基层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三方角力的独特车间政治。渠敬东等（2015）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总体体制下的企业与职工关系、双轨制改革中的劳动关系转变、市场化改革中劳动与资本

关系的变迁。田毅鹏等（2015）提出了“重回单位研究”的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和单位体制研究上，社会学界在第二阶段就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那时已开始拓展历史维度的研究。现在的研究是此前基础上继续推进，从而为单位制研究这个在中国社会学中非常亮眼的主题再添异彩。

3. 群众路线及群众团体形成和变迁的历史分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静（2010，2013）从历史视角出发，分别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动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群众路线进行考察，探究了中共群众动员方式和群众路线的形成。孟庆延（2018）通过考察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苏区时期从事的主要农村调查实践与文本，认为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传统。而阶级划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政治传统。孟庆延（2015）认为这一政治传统的最初形态可以追溯到1933—1934年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经济因素为标准的阶级成分划分开始在革命中得以大范围实践，同强调情绪性和斗争性的社会动员一并构成“查阶级”的重要内容。社会学界在第二个阶段就已经在土地改革时期的社会动员和阶级划分问题上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而现在的研究把视野拓展到了新中国成立前，这使我们能够在理解中共革命传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更好地追根溯源。

农民运动和农村集体化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研究聚焦分析中共成立以来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村集体化的实践。孟庆延（2016，2017）考察了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重要历史担纲者王观澜的生平、教育和精神气质，呈现了土地革命中“算阶级”的实践轨迹；分析了农运派干部的担纲者澎湃的具体实践，呈现了群众“鼓动家”的“闹革命”的组织动员形态。李里峰（2010）认为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一种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卢晖临（2015）描述了1930—1940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历史阶段农民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展示了农民在集体制度形成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与人民公社制度的互动、融合。张乐天（2016）以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全方位展现了人民公社的面貌。社会学界以往在这个主题上的研究也是主要集中在土地改革时期。而现在的研究向两头延伸，一头向后伸向苏区时期，另一头向前伸向人民公社时期，使这一主题在历史的纵深处得以深化。

工人运动、工会组织是劳动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研究聚焦分析中共成立以来工人运动的实践和工会组织的变迁。我们曾对中共最早领导工人运动的全国

总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渊源和运作进行分析，认为其在性质上既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也不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前身，而是前“党团”时期一种混合的制度形态；比较了早期安源工运中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的工作效果，讨论了中共早期采用的特派员制度和发动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马学军，2016、2017）。而游正林（2010，2017，2020）讨论了苏区阶级工会的兴起；考察了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探讨了这种革命的劳动伦理是如何被构建而兴起；梳理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的社会背景、理想形象和改革后果。劳动社会学以往更多把焦点放在当下的劳动关系等问题上，而现在劳动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使我们对中国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理解建立在自己独特的传统上。

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是家庭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一些研究聚焦分析中共成立以来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困境和变化。从小平（2015）对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纠纷案例和婚姻政策变化的分析，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婚姻自由”观念在北方乡村社会的社会改造中遭遇的挫折；王颖（2018）通过分析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指出共产党的妇女政策经历了与家庭分离、与集体整合、家庭与集体的整合三个阶段；程文侠、李慧（2019）认为中共为缓和党群关系，一度激进的妇女政策在1940年代转向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家庭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一开始就确立的重点主题之一，但历史维度的研究尚不多见。现在的研究进展使家庭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在革命的主题上实现了对接。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人物的口述史访谈和研究，有助于拓展历史资料，记录普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提供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深化对集体记忆、思想改造等议题的研究。周晓虹（2019，2020，2021）近年来开展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等口述史研究，意在呈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群体和人物的生命历程和集体记忆，重构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场景，以理解建国之后的个体、社会与历史；三线建设的社会学研究尤其可以锻造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刘亚秋（2021）从口述史与社会记忆视角出发，提出口述史研究对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通过对知青口述记忆研究，探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特征。在第二个阶段由孙立平倡导的口述史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口述史特别是土地改革口述史。而现在由周晓虹所倡导的口述史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各群体生命历程

更全面的展开，同时，对口述史的社会理论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

4. 思想改造及道德重塑的历史分析。中共革命不仅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是思想改造和价值重塑的革命。李放春（2010，2021）对北方土地改革期间的“翻心”实践考察，揭示出现代革命实践与关注心术与教化的中国传统之间的深刻延续性，并进而指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即突出“心”“思想”“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张静（2017）依据江南某地在20世纪50年代的干部档案材料，指出国家运用特有的组织化权力，针对干部群体开展了一系列治理活动。王余意、周晓虹（2021）以青年学生舒文秉的日记（1951—1955）为例，探索了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价值重塑。我们在第二阶段已经看到中国社会学界初步提出了“新德治体制”的概念。而现在对思想改造和道德重塑的研究使这个概念真正获得了丰满的生命力。

这四个类别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从社会学的视角深化和丰富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认识，也有助于大大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边界和主题。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已经不再像第一个阶段那样仅偏重宏观结构分析，也不再如第二个阶段那样主要借用西方理论，而是把中共革命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来分析中共革命的源流及其实践，更多侧重革命的行动分析、实践分析和历史分析。第二，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研究。如单位制研究、土地革命社会动员研究和口述史研究在第二个阶段就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而现在的研究进一步拉长了分析的历史时段，分析的面向更加宽广，在理论上的提升也更重视与传统中国伦理和文化的勾连。第三，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劳动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分支社会学，更多尝试从历史的视野来理解当下中国政治、劳工、家庭、乡村问题的历史根基和基本特性。第四，分支社会学之间以及一级学科（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之间进一步交叉和交融。如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都高度重视对“国家治理与政府行为”的历史研究，正在打通与革命研究的关联；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相互借鉴，共同推进对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民运动、社会动员和阶级划分的深入研究；社会学和政治学学科相互交融，共同推进对群众路线、思想改造和道德重塑的深入研究。不过，最近十多年来研究成果，尽管在行动分析和历史分析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在如何与结构分析进一步结合上尚待加强。

五、小 结

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2017：6）对具备“社会学想象力”心智品质的研究者有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在面对任何一个社会现实时，都会坚持不懈地追问三组问题：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不同的人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米尔斯的这三组问题，恰恰包含了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即结构、行动和历史。本文选择从这三个维度入手来梳理西方经典社会学、欧美历史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也正是希望能紧扣社会学的基本视角，来勾勒社会学革命研究的基本脉络，明确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的意义和地位。

西方经典社会学、欧美历史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在结构、行动和历史分析上表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以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经典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但展示了结构、行动（及民情）和历史维度有机融合起来的大师风格。作为美国历史社会学第二波和第三波的代表人物，斯考切波和林恩·亨特都以研究革命著称，推动了革命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复兴，拓展了革命分析的结构性视角和文化视角，但存在舍一就一的偏颇性，对革命的复杂性理解有所不足。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最初散布在其它领域研究中，侧重宏观结构分析，而在最近十多年来开始呈现出“历史社会学的转向”和“把革命带回来”的热潮，并在行动分析和历史分析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在如何将其与结构分析进一步结合上尚待加强。

本文之所以提出结构、行动与历史在革命研究中的融合，并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具体研究都必须三者兼顾。这既不必要，也无可能。笔者要强调的是，每种分析维度都各有长短，研究者在着重应用某一维度时，需要保持与其它维度必要的张力，需要认识到每种维度的适用性和限度，防止一叶障目，落入结构决定论、行动意志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在保持各种维度必要的张力上，西方经典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杰出的研究范例。而中国社会学的革命研究方兴未艾，需要认真琢磨这种经典的风范，在探索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阿隆，雷蒙，2015，《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程文侠、李慧，2019，《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社会》第3期。
- 崇明，2014，《自由革命的专制命运：托克维尔的未完成革命著述》，《社会》第5期。
- 丛小平，2015，《从“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的重塑》，《开放时代》第5期。
- 邓正来、亚历山大，1999，《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冯仕政，2007，《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11，《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第1期。
- 2012，《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戈尔斯基，2021，《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李钧鹏、李腾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亨廷顿，2017，《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晨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贾文娟，2016，《选择性放任 车间政治与国有企业劳动治理逻辑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放春，2010，《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第10期。
- 2021，《“心”与“理”：革命史研究中的“中国哲学”问题》，《开放时代》第1期。
- 李里峰，2010，《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李猛、周飞舟、李康，1999，《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12辑。
- 林恩·亨特，2011，《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0，《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亚秋，2013，《“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社会》第2期。
- 2021，《口述、记忆与主体性 社会学的人文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路风，1989，《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1993，《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5期。
- 卢晖临，2015，《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卢卡奇，2009，《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恩格斯，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学军，2016，《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渊源与演变再考察》，《学术交流》第2期。
- 2017，《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1921—1929）》，《社会》第2期。
- 麦克莱伦·戴维，2016，《马克思思想导论》第3版，郑一明、陈喜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孟庆延，2013，《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 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社会》第2期。
- 2015，《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之发轫新探》，《开放时代》第6期。

- 2016,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 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社会》第4期。
- 2017, 《“深耕者”与“鼓动家”: 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社会》第3期。
- 2018, 《理念、策略与实践: 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米尔斯, 2017, 《社会学的想象力》,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渠敬东、傅春晖、闻翔, 2015, 《组织变革和体制治理: 企业中的劳动关系》,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斯考切波, 2007, 《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 封积文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9,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何俊志、王学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孙立平, 1988, 《社会现代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1991, 《辛亥革命中的地方主义因素》, 《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 1992, 《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衰败过程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1994, 《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间互动关系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
- 1997, 《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战略与管理》第5期。
- 2005,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田毅鹏主编, 2015, 《重回单位研究——中外单位研究回视与展望》,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托克维尔, 1997, 《旧制度与大革命》, 冯棠译, 桂裕芳、张芝联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9, 《论美国的民主》(上), 董果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奇生, 2013, 《高山滚石: 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5期。
- 2015, 《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 《社会科学》第11期。
- 王星, 2014, 《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 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颖, 2018, 《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1937—1945)》, 《开放时代》第4期。
- 王余意、周晓虹, 2021, 《“新人”的塑造: 社会表征与个体认同——以青年学生舒文秉的日记(1951—1955)为例》, 《社会学评论》第4期。
- 韦伯, 2015, 《思想与社会 论俄国革命》, 潘建雷、何斐斐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吴长青, 2012, 《革命伦理与劳动纪律——20世纪50年代初国营企业的劳动激励及其后果》, 《开放时代》第10期。
- 肖瑛, 2016 《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 《学术月刊》第9期。
- 严飞, 2019, 《历史社会学的第四波思潮: 议题与趋势》, 《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
- 应星, 2001,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北京: 三联书店。
- 2015, 《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 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16, 《“把革命带回来”: 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社会》第4期。
- 2017, 《事件社会学脉络下的阶级政治与国家——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 《社会

- 学研究》第2期。
- 2018,《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开放时代》第5期。
- 2020,《军事发包制》,《社会》第5期。
- 2021a,《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一个批判性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21b,《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开放时代》第4期。
- 应星、李夏,2014,《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第5期。
- 游正林,2010,《60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17,《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第5期。
- 2020,《苏区阶级工会的兴起》,《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
- 张静,1998a,《国家与社会》,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
- 1998b,《法团主义及其多元主义的主要分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0,《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动员》,《战略与管理》(内部版)第7、8期
- 2013,《解放区时期的群众路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社会史研究》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17,《构造组织观念自我检查和审干(1952—1960)》,《社会》第5期。
- 张乐天,2016,《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赵鼎新,2005,《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周锡瑞,2013,《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董玥编《走出区域史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晓虹,2019,《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 2020,《口述史与社会记忆:现状与未来》,《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2021,《口述史、三线研究与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
- 周雪光,1992,《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2014,《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第4期。
- 2017,《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9,《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Adams J. ,E. Clemens & S. Orloff 2005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马学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应星)

责任编辑: 张书琬

structural/mechanical narratives. At the same time , as hidden texts , events hide in the process narratives. Both of them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rhetoric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Structure , Actions , and History: The Origin of Studies on Revolution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Ma Xuejun & Ying Xing* 84

Abstract “Revolution” is a vital force for transitions in modern history worldwide and a critical sociological topic. Marx’ s and Tocqueville’ s studies on revolutions include multiple aspects , such as structure and action , reality and history , society and politics , mores and ideas , etc. They regard revolutions as not only a simultaneous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 but also a historical proces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gency of specific actors. In the 20th century , European and American sociologists conducted monotonous structural or cultural analyses of revolutions. By contrast , Chines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ommunist civilization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findings , from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to organizational actions and ideologies. This paper follows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sociology to critically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sociological studies on revolution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War and Civilization: A Reflection o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Wang Qingming & Sun Meiling* 107

Abstract: Karl Polanyi considered the era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a “hundred years’ peace ,” with an internal drive of development stemming from the interplay between market and society. Sandra Halperin criticized Polanyi for ignoring the class perspective. She put forward the opposite point of view: the 19th century was a period of continuous wars and development that stemmed from a dualism of internal exploitation and external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Halperin’ s and Polanyi’ 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wars lead to divergent war narratives. Moreover ,their conflicting 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ed to their disagreement on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olanyi did not ignore class but opposed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adhered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lass. Halperin emphasized that the disembedding of the economy from society and the re-embedding of the economy into society were two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PAPER

Opportunities in a Crisis: Solidarity Atmosphere and Mobilizing Structures of a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 *Liu Shiyang & Deng Yanhua* 123

Abstract: Homeowners’ spontaneous establishment of a homeowners’ committee indi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ublic spirit. This study views founding a homeowners’ committee as a collective action i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mobilizing